

萊茵霍爾德·尼布爾與冷戰

歐陽肅通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萊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美國本土神學家與社會活動家,在美國政界與公共知識界的影響一向頗大,不容忽視。尼布爾自從一九三〇年代以來,神學家的地位得到普遍確認。他比較系統的神學理論著作大多產生於此前後,過去學界對其研究的重點也主要在這一塊,而對其冷戰時代的後期思想活動關注較少。然而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尼布爾一向積極參與現實,絕非局限於象牙塔內學者。在這方面,他最突出的就是對冷戰的積極參與和思考,並且由於他在該領域的影響,他於一九四八年三月成為了《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他在這個領域傾注了其後半生,該領域過去卻沒有得到足夠的研究重視。但儘管如此,他的影響力卻從未消失。

本世紀以來、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後,在美國公共知識界出現了可稱為「尼布爾復興」的現象。面對複雜的國際現實,許多人開始重新關注尼布爾後期的思想活動,並紛紛從中尋找思想資源,許多不同政治派別都將尼布爾為我所用,從極右派到左派都有。¹它們儘管不能算是對尼布爾的客觀研究,但卻至少從不同層面揭示了尼布爾所具有的豐富現實意義。另外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尼布爾與當今美國領導人的思想關係。現任總統奧巴馬宣稱尼

1. 歐陽肅通,〈美國基督教界的「新保守派之父」尼布爾的復活〉,《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4期,頁171-176。

布爾是他最敬佩的思想家之一，而曾是總統候選人的希拉蕊在其自傳中也一再談到尼布爾對自己影響。這樣看來，研究尼布爾在相關領域的價值與潛在影響，是有非常強的現實意義。它不僅讓我們理解為甚麼神學家尼布爾可以成為美國當代公共領域的重要思想資源，也有助理解當今美國處理對外關係的某些思路。然而，漢語學界目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相當不足，因此本文打算圍繞着尼布爾與冷戰這一主題，闡釋相關問題。

一、尼布爾對冷戰的直接參與

緊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發生的東西方冷戰，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歷史的重大事件。但是在對於冷戰的態度上，尼布爾也並非從開始就是明確的，他立場的確立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在二戰期間，尼布爾開始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是後來卻成為了和平主義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是個堅定的反納粹鬥士。在戰後，尼布爾經歷了類似的轉變。起初，他並不主張與蘇聯對抗。這部分是由於當時人們渴望和平的普遍願望，部分也是因為尼布爾個人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起初並不厭惡。研究者指出，戰爭期間與對納粹主義的態度相比，尼布爾對於斯大林主義的態度是仁慈的，他對於斯大林本人有過一些好評，他甚至一度把蘇聯與西方世界的衝突比作歷史上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衝突。²另外，二戰末期英國工黨在大選中的獲勝也給了尼布爾另一種希望，希望能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走出「第三條道路」。³然而戰後的歐洲之行讓尼布爾最終改變了立場。

一九四六年夏，尼布爾參加了由美國國務院所組織的一個考察團，赴德國美佔領區評估當地的文化教育體系。通過這次為時幾個月的考察，尼布爾親眼目睹了戰後西歐地區的蕭條和動盪，

2. John Coffey, *Political Realism in American Thought* (Lewisburg, PA: Burknei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26.

3. Richard Fox, *Reinhold Niebuhr: A Biograph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7), pp. 224-225.

切身感受到冷戰前線緊張的東西方關係。這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尼布爾原來的態度，德國西方佔領區的人民正面臨着共產主義的威脅，「我看到了蘇維埃宣傳所產生的效果，在歐洲和德國的民主力量中間恐懼和絕望感日益傳播」。⁴尼布爾並提出了自己對於如何解決問題的看法。當時在如何處置戰後德國的問題上國內有一派持強硬立場的人，他們曾為美國制定了一個「摩根索計畫」（Morgenthau Plan），意在將德國徹底削弱，並分裂肢解，這計畫的部分內容被寫入了戰後對德政策中。而尼布爾對此表示反對，在他看來，當時最大的危險已經不是德國而是共產主義。而當時德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乃是經濟問題，而經濟的凋敝正是產生共產主義的土壤，「而一個四分五裂的德國將會陷入經濟上的悲慘境地……而這正中俄國人下懷，他們就希望通過把這種悲慘境地歸咎於資本主義的剝削來實現意識形態上征服對方的目的。」⁵所以尼布爾極力呼籲加強戰後德國經濟的重建才是當務之急。尼布爾的這些呼籲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因為後來美國的政策就是沿着這一方向進行的。為了加強國內維護自由民主的社會力量，尼布爾還推動組織了一個社會團體——追求民主行動的美國人（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 [ADA]），進行了積極的院外活動。

一九四七年是冷戰標誌性的一年，在這一年出現「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和喬治·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遏制」戰略。三月份，杜魯門總統向國會宣讀了後來被稱為「杜魯門主義」的諺文，被視為對蘇聯發動冷戰的宣戰書。杜魯門主義提出的直接原因是希臘和土耳其的局勢。尤其是當時希臘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日益強大，很有可能在內戰中奪取政權。當時支持希臘政府的英國人

4. Reinhold Niebuhr, "The Fight for Germany," *Life* (Oct 21, 1946), p. 66.

5. 同上，頁 70。

窮與應付，只好向美國求助。在美國人看來，一旦希臘出現崩潰，將會危及整個東地中海甚至中東地區，這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為此，杜魯門在諮文中要求向希臘、土耳其兩國提供經濟與軍事上的援助，以抵制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對於杜魯門的要求，新成立的 ADA 組織表示了明確的支援。但是國內的一些自由派勢力、以前內閣成員華萊士（Henry Wallace）為首卻表示反對，即使 ADA 內部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也是心存疑慮的，另外當時的兩國政府（自由派視之為反動政權）是否值得援助也是個問題。⁶但是尼布爾對此堅決駁斥，他認為對希臘、土耳其兩國的援助是絕對必須的。人們可以對美國援助的具體政策有看法，但是應當看到在這一政策中受益的不單是這些國家的內部政體，更是因正在受到共產主義的日益威脅而搖搖欲墜的歐洲和平。對於尼布爾來說，對兩國援助的象徵意義是關鍵，「至於希臘和土耳其兩國是否真的受到了蘇維埃政權的威脅，在他看來反倒成了一個無須關注的次要問題」。⁷由此人們看到，尼布爾終於成為一個堅定的冷戰份子。

冷戰的另一事件是「馬歇爾計畫」，這一計畫與尼布爾的想法倒是不謀而合，前面已提到，尼布爾早在訪德之時就大力呼籲要幫助戰後西歐的重建。在馬歇爾提出計畫不久以後，尼布爾就撰文稱讚這一計畫是「戰後歷史的轉捩點」，它將「提高西方與美國的威望，而使共產主義減少吸引力。」⁸尼布爾贊同馬歇爾計畫不僅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他也坦率承認，美國的「慷慨」最終將會使自己得到更大利益，因為對歐洲的援助最終還會用來購買美國的貨品。⁹

6. Mark L. Kleinman, *A Word of Hope, a Word of Fear: Henry A. Wallace, Reinhold Niebuhr,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7. Fox, *Reinhold Niebuhr*, pp. 231-232.

8. Reinhold Niebuhr, "Editorial Notes,"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Aug 4, 1947), p. 2.

9. Reinhold Niebuhr, "The Marshall Plan,"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Oct 13, 1947), p. 2.

但是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尼布爾最密切地捲入了決策的，是由喬治·肯南所發起的冷戰宣傳。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畫是美國政府高層的決定，尼布爾雖然可以表達支持和贊同，但他畢竟是個局外人。可是，對於冷戰的意識形態宣傳戰略來說，尼布爾不僅不是局外人，甚至可以說是舉足輕重。其實早在戰後初期，尼布爾的作品就通過美國軍事佔領當局介紹予歐洲大眾。那時美國人的行動目的還算溫和，主要是通過發行一系列美國的文學家和學者的作品來提高自己的聲望，運作方式也是商業化的，一方面是為了作意識形態上的宣傳，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改變當時歐洲普遍對美國為「文化沙漠」的偏見。¹⁰由此也可以看出，作為一個在三十年代初獲得過歐洲「季福特講座」(Gifford Lectures)榮譽的學者，尼布爾的意識形態「價值」很早就被美國官方注意到。不過這種較為消極的策略很快就被更為積極的手段所取代。

在肯南發表了鼓吹「遏制」戰略文章的一九四七年，中央情報局(CIA)也宣告成立，肯南本人也是中情局的建立者之一。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友人的撮合下，肯南及其政策制定組邀請尼布爾前往與他們做了為期兩天的討論，討論的範圍很廣，尼布爾後來曾對好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後來擔任過甘迺迪總統的政治顧問)提及，討論的主題是有關「歐洲和亞洲的長遠觀念」。¹¹尼布爾本人對這些事情也很有熱情，而且在此過程中他和肯南也成為好友，以致有人曾把尼布爾和肯南、摩根索稱為冷戰的三個推手。不過中情局成立前後的很多檔案至今未完全解密，因此尼布爾在這一系列事件中究竟起了甚麼作用，至今仍有爭議。史東(Ronald H. Stone)認為尼布爾的思想對於當時美國的政治現實主義者們產生了深刻而實質的影

10. 桑德斯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頁19。

11. Fox, *Reinhold Niebuhr*, p. 238.

響。¹²但福克斯（Richard Fox）則認為「尼布爾在這些過程中沒有可以清楚分辨的影響。另外曾有媒體廣為報導說，肯南曾一度稱尼布爾為『我們所有人的父親』，但是他後來的回憶並未這樣提及。」¹³不過正是從這一時期始，尼布爾同美國政府打交道的次數明顯增加。同年九月，尼布爾受美國國務院的委託，作為美國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出席了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次大會，在會上尼布爾針對文化問題發表演講。從巴黎返國後，尼布爾向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報告了會議事務，並向艾奇遜提出建議，希望能通過聯合國，加強爭取非共產主義世界。不過艾奇遜對他的建議不置可否。¹⁴但不管怎麼說，頻頻出席官方場合畢竟也大大提高了尼布爾的聲望。

尼布爾捲入了文化冷戰的程度，難以做出確切評估。與他的老朋友施萊辛格比起來，他當然是有所不如了，後者當時可是中情局的正式成員，為中情局做了大量文化冷戰的領導工作——包括公開的和秘密的。大概是出於同施萊辛格的關係，尼布爾參加了總部設在歐洲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工作。這一披着文化外衣的機構堪稱是中央情報局領導下的最大，也是最成功的文化冷戰機構，今天我們所熟悉許多文化成果竟然都與之有關。比如今天大家十分熟悉的現代派藝術，竟是因為代表大會當年看中了它作為與蘇聯文化鬥爭的武器，施以大量金錢援助才得以興盛一時。另外還有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之所以為大家所熟知，都與之有關。英國學者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研究揭示出，當時無數知識分子都捲入了其中——包括知情與不知情的。當然尼布爾是徹底的知情人，他接受了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榮譽贊助人的頭銜，另外他還是

12. Ronald H. Stone, *Reinhold Niebuhr: Prophet to Politician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1), pp. 169-170.

13. Fox, *Reinhold Niebuhr*, p. 238.

14. 同上，頁 238-239。

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的核心成員，該會與歐洲的代表大會遙相呼應。尼布爾和施萊辛格大力協調這兩個機構的共同工作。另外利用宗教作為與共產主義鬥爭的強大武器，也是尼布爾對冷戰所作的一大「貢獻」。¹⁵

總的來說，自從尼布爾在冷戰初期確立了其基本態度之後，其看法長期都沒有根本變化。即便在六十年代他對美國越南政策的批評，也如其當時的助手所指出，「並非要反對美國力量抵抗共產主義擴張的一般需要，而只是批評越南政策的許多細節問題」。¹⁶在公眾面前，雖然並非那種極右翼人士，但尼布爾始終還是以一位堅定的反共人士的形象出現的。在這一點上，他和那些基於左傾而反對越戰的人士有着根本區別。不過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尼布爾又是一位溫和的反共人士，而絕非極端派，在反共的同時他也並沒有變成一個美國特殊論者。正如福克斯所指出的，「即使是在他激烈抨擊蘇維埃『暴政』的同時，他也在批判那種對邪惡的蘇聯帝國和高尚的美國民主作簡單的二分法。尼布爾的反共主義乃是反共主義的第三種力量。」¹⁷這點在他的學術活動中更為明顯地體現出來。

二、世界危機的挑戰

尼布爾畢竟不是政府人士，而是一位神學家與教會牧師，因此他對冷戰文化宣傳活動雖然積極，但不可能佔據他的全部時間。並且更重要的是，自一九五二年二月中風之後，他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因此此後他把更多時間用在著述、而非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不過他這一階段學術活動的大背景仍與對冷戰的關注息息相關，在此意義上，也可將尼布爾此期的著述視為對冷戰的一種間接參與。尼布爾這一時期的著述儘管龐雜，但大體上是圍繞着

15. 桑德斯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頁 176、318。

16. Stone, *Reinhold Niebuhr*, p. 175.

17. Fox, *Reinhold Niebuhr*, pp. 232-233.

這樣的主題來開展的——即「世界危機與美國的責任」。事實上，同時代人便明確認為，「尼布爾對於美國生活和思想世界的貢獻很多，可是他最大貢獻恐怕還要算他對於世界危機的解釋。他對於世界危機的了解，由於美國保衛西方文化的責任日見繁巨，意義更加重大。」¹⁸

尼布爾認為西方文明正面臨着有史以來的第三次危機：第一次是羅馬帝國的衰亡，第二次是封建主義的崩潰和我們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的產生；而當下，是我們的民主社會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並且由於西方文明自近代以來日益成為世界的中心，故而當代西方文明的危機也就進一步成為了世界混亂的根源與核心。¹⁹尼布爾指出，我們時代的世界危機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政治宗教的興起，此種運動已欺騙了億萬人，並且用透過烏托邦幻想和權力衝動的結合而產生的政治力量，俘虜了很多國家。²⁰作為一名思想家，尼布爾對危機的分析並沒有簡單地從表面出發，而是指出，當代世界危機的根源在於現代西方文明的危機。他認為，這類政治宗教的興起與傳統基督教信仰的衰落有關，具體而言，基督教信仰衰落所留下的真空被三類不同的信仰形式所填補：（一）自由主義信仰；（二）馬克思主義信仰；（三）法西斯主義。²¹法西斯主義在二戰中已經遭到毀滅性打擊，因此當代世界危機的體現便是（一）和（二）的對抗，但從根本上說，它們都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在尼布爾看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實質是千禧年主義的變種，後者源自基督教的終末論，它希望「透過有用的革命暴力去消除對權力的需要，從而在純粹的無階級社

18. 黎菲涅，〈尼布爾論世界危機〉，載萊因霍爾德·尼布爾著，劉蘭富譯，《世界危機》（香港：今日世界社，1963年），頁1。

19. Reinhold Niebuhr, "God's Design and the Present Disorder of Civilization," in *The Church and the Disorder of Society*, Vol. III (Amsterdam Assembly Series; NY: Harper & Brothers, 1949), p. 13.

20. 萊因霍爾德·尼布爾著，劉蘭富譯，《世界危機》，頁1-2。

21. Reinhold Niebuhr, "The Religious Level of the World Crisis,"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Jan 21, 1946), p. 4.

會中，建立起無政府的千年王國。」²²由此，通過所謂新興政治宗教的批判，尼布爾將其神學在事實上生發成了一種反共神學。

當時美國國務院一些官員認為，共產主義只不過是舊俄羅斯帝國主義的某種翻版形式而已。尼布爾指出這不僅是一種誤判，而且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²³因為共產主義以其理想主義色彩獲得一定的道德基礎，從而使得它在西方世界也得到不少人、特別是知識階層的認同。這新的政治宗教的可怕之處，還在於它全然與西方社會為敵，並以顛覆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為目標。因此尼布爾認為，共產主義在我們這個世界的冒升，比得上中世紀伊斯蘭教的產生和它對基督教文明的挑戰。²⁴換言之，這完全是兩種世界觀、兩種生活方式和兩種宗教的對抗，它們的矛盾在根本上是不可調和的。因此共產主義絕不簡單是舊帝國主義的產物，它有其更深層的原因。

也正因此，尼布爾充分注意到一個現實。在美國和蘇聯於世界範圍內進行的意識形態競賽中，美國常常處於一種不太有利的位置，蘇聯的意識形態在廣大的東方世界贏得了巨大的迴響，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既有現實的也有歷史的。西方世界被攻擊的一個主要議題，就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問題，因為幾乎所有的東方國家都被西方國家殖民過。尼布爾並不否認這一事實，但是在對它的評價上，他卻認為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尼布爾指出這些富有活力的西方國家在擴張自己的統治時，主要源於三個衝動。一是傳教的衝動，不過這並非指基督教傳播，而是指西方人要把自己的文化（不論是經濟、政治還是宗教的）傳播到世界的強烈使命感。在這裏，當然也包含着西方人的一種文化優越感。其次是經濟的衝動，這裏面既有經濟剝削的也有擴展商業貿易的願

22. 尼布爾著，蔣慶譯，〈神意與當代文明的混亂〉，載劉小楓編《當代政治神學文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頁12。

23. 萊茵霍爾德·尼布爾著，劉蘭富譯，《世界危機》，頁29-30。

24. Reinhold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London: Nisbet & Co., Ltd, 1952), p. 128.

望。但在這個問題上，蘇聯的宣傳總是抓住經濟剝削的問題不放，對西方世界大肆攻擊。第三個較難界定，不過可以把它們泛稱為政治的衝動，它包含了西方民族國家對於權力和榮耀的追求。²⁵這些衝動所導致的後果是多重的，在對於它的評價方面，尼布爾的整體看法是：

技術社會對非技術社會的第一個衝擊的確是剝削，這是造成非工業世界反抗的怨恨的基本原因。這一由「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衝擊所造成的怨恨今天仍然運作着。……但是另一方面，帝國主義所造成的經濟後果又決不像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那樣是徹底的罪惡，因為它也把先進的技術和教育介紹給了農業社會。²⁶

總的來說，殖民主義的遺產具有二重性，不能簡單否定之。這也是尼布爾在評論美國外交政策時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他也一直不遺餘力地為西方、特別是美國做辯護。他看到除了帝國主義這一歷史的因素，造成普遍怨恨另一個原因則是由於非工業世界的普遍貧困。這種貧困狀態其實早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就存在了，但不幸的是，這一現象成為了所謂帝國主義對東方國家造成的精神傷害的象徵，而西方國家自身也為此付出了代價。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自身也曾經是從殖民地獲得獨立的美國，居然也成為了這一歷史後果的替罪羊，在非西方世界為此屢受指責。而西方國家的富裕，又正好可以被蘇聯宣傳成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剝削的結果。相比之下，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宣傳活動就要失敗得多。但尼布爾認為，這完全是蘇聯政治宣傳的蠱惑所造成的是非顛倒，事實的真相其實是：「那些殖民

25. Reinhold Niebuhr, *The Structure of Nations and Empir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9), pp. 202-203.

26.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p. 112.

地國家乃是因為缺乏足夠的自我治理能力，才會導致在獲得解放後反而處於各種政治與經濟的混亂之中。」²⁷

尼布爾對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態度，最能體現上述立場。該年，埃及新興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民族主義政權宣佈把長期為英國所經營的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此事引起了英國的強烈反應，它聯合了法國和以色列一起對埃及進行軍事干涉，佔領了蘇伊士運河。如何回應此事，在美國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不同的反響。新興的前殖民地國家理所當然都支持埃及，意想不到的，一向在許多問題上針鋒相對的美蘇兩國，這次也都站在了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上。在各國、主要是美蘇的壓力下，英法被迫撤兵。這一事件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強烈爭論，矛頭主要是針對艾森豪政府該不該反對英國、支持埃及和過於支持聯合國在這方面的作用。一些自由派人士比較贊同政府的立場，而以摩根索和尼布爾等人為一方，對美國政府的態度持明確批評立場。²⁸針對艾森豪威爾總統對蘇伊士危機的電視講話，尼布爾做了公開的批評，他認為，當總統先生宣佈支援埃及人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時，卻意味着把一條西方經濟的生命線置於納賽爾的控制之下，這是毫無道理的。²⁹看得出來，尼布爾對於納賽爾這位第三世界的反殖英雄並無甚麼好感。尼布爾坦率指出，不幸在於，當今許多獲得「解放」的國家既無法建立穩定，也毫無秩序可言。甚至這些新興國家的民族性和凝聚力，其實也是來源於它的前宗主國的，因此對於西方人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事業不應片面否定。美國由於自身是從反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戰爭中獲得獨立的，這一特殊歷史使得美國人容易產生反帝反殖情緒。但是尼布爾卻提醒美國人，不應該受此情緒左右，甚至產生某種不應

27. 同上，頁115-116。

28. Stone, *Reinhold Niebuhr*, pp. 184-191.

29. Niebuhr, *The Structure of Nations and Empire*, pp. 16-17.

該的內疚感，艾森豪威爾政府在蘇伊士危機上所犯的錯誤正是這樣一個例子。³⁰

如何應對我們時代的世界危機？除了抨擊共產主義的邪惡之外，尼布爾也批評自由主義人士對待危機的不當態度——他們在二戰前時常表現為和平主義的幻想，而在冷戰時期又時常表現為世界政府的幻像，尤其是在對聯合國的看法上。尼布爾的基本態度以為，聯合國的出現有其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不能對它抱以過高希望。特別在冷戰的背景下，聯合國的功能及作用是很曖昧的。儘管尼布爾充分肯定建立世界秩序的必要性，但就聯合國而言，常常因大國使用否決權而無所作為，因此尼布爾認為我們應當對聯合國的作用抱以現實的態度，因為國際社會間的許多問題都是超出了它的能力範圍的，而要靠它來解決東西方之間的對抗更是不可能的。³¹既然世界政府是一種不可能的幻象，則在現實當中，由具體的國家來應對危機的挑戰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環顧世界，誰具有這樣的力量？隨着冷戰的發展，尼布爾越來越看到，讓美國這一自由民主世界的旗手來承擔這一責任，雖然不是最圓滿的選擇，但卻是一個最現實和最不壞的選擇。尼布爾以一種天命式的口氣說：

假如我們把我們國家所面對的當代局勢摘要說明，我們可以簡略地把我們的兩難問題作這樣的陳示：當潛存的世界社會在鑄造而尚未實現之時，在歷史的這個時刻我們被徵召為自由世界的領袖。（終有一天）人們將會承認：包括我們世界領袖身份的短暫的學徒時期，以及我們國勢迅速的興起在內，歷史條件的這種複雜性給予我們的國家以最嚴厲的挑

30. 同上，頁 11-12。

31. 萊因霍爾德·尼布爾著，劉蘭富譯，《世界危機》，頁 44-48。

戰，而在世界歷史上，也從不曾有任何一個國家曾面對過如此嚴厲的挑戰。³²

三、美國的歷史責任

雖然歷史已經賦予了美國擔當偉大的世界責任，但她在運用自己的力量方面還是很不成熟的。美國在極短的時間就被突然拱上了世界領導者的地位，這種突如其來的地位，反倒讓她無所適從，因為她甚至還不曾真正理解自己的力量，也沒有學會承擔隨之而來的種種責任。有的人以「上帝選民」的驕傲觀點來看待自己國家的現實，而有的人則無所適從，不知該如何是好。尼布爾以為，美國人要真正理解與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自己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而要清醒瞭解美國的現實，就要清醒地了解美國自身的歷史，從歷史中反思並吸取教訓。尼布爾主張美國人既要認識到美國歷史與現實責任的反諷性一面，也要積極面對並承擔其帝國的歷史責任。這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如果忽視這點的話，就必將導致對其基本政治立場理解的嚴重偏差。

美國的歷史給我們提供的並不是一出輕鬆的喜劇，而是歷史的反諷。尼布爾經常談論「美國歷史的反諷」這一主題，包括曾以此為書名編過文集。尼布爾對「反諷」(Irony)概念，是在神學的象徵隱喻意義上運用的。反諷是由生活中偶然的和不諧因素造成的，它根植於人性固有的弱點，因此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但是人或國家如果能意識到自己身在其中的話，仍可能解脫。³³尼布爾認為當前美國所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種反諷的境遇。

年輕的美國是一個天真的國家，但正是這個年輕的國家卻成為了今天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度。美國自立國以來，長期執行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儘量不涉入歐洲大陸的事務，但是最終卻成了

32. 同上，頁 12-13。

33.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p. viii.

西歐諸國的保護者和當今世界的霸權之一。一個未去刻意追求這些東西的國家反而得到許多其他國家想得到但卻得不到的東西，這一切本身就是非常反諷的事情。³⁴在美國的歷史上，究竟是哪些特徵決定了今天美國性格與命運中那些反諷因素的存在？尼布爾從自己國家的宗教傳統與世俗傳統兩個方面做了考察。從近代以來，傳統的宗教虔誠與現代的世俗主義並存乃是西方文明的一個基本特徵，但這一特徵又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比美國表現得更典型、更與眾不同了。無論是這一領域最早的經典闡釋者托克維爾，還是尼布爾之後的本土學者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都注意到這一現象：即美國人既比歐洲人有更多的宗教狂熱，卻又更為世俗化。³⁵應當從何種角度來理解美國的這一看似矛盾的特徵？尼布爾認為，美國歷史中虔誠與世俗的這兩種成分構成了理解美國性格命運的重要基礎，這二者相互映彰，都構成了美國文明的重要特色和與眾不同之處，也使得美國避免了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那樣的災難。難怪尼布爾說，「如果對我們國家中宗教虔誠與世俗主義的這種獨特關係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話，那麼很明顯，我們要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為宗教化，也更為世俗化。」³⁶而正是美國的這一雙重性格，造就了他在面對國際事務時充滿矛盾的態度，而這樣的矛盾無疑也構成了美國人在其世界責任上的反諷性。

尼布爾針對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曾這樣評論：「我們的外交政策揭示出，在我們早期天真的幻象與目前的艱難現實之間有着非常顯著的矛盾。」³⁷美國人常常喜歡把自己在對外關係上的動機視為無私的，但尼布爾的這一番話顯示出了美國在對外關係

34. 同上，頁 69。

35. 西摩·馬丁·李普塞著，范建年、張虎、陳少英譯，《第一個新興國家》（台北：桂冠圖書，1994）。

36. Reinhold Niebuhr, *Pious and Secular America* (New York: Scribner, 1958), p. 11.

37.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p. 35.

上的反諷性，自以為「天真」的美國在現實的對外關係方面其實並非如此。尼布爾坦率承認，無論是西部領土的擴張，還是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那樣的對外戰爭都表明，年輕的美國在攫取自身利益方面一點也不「天真」。只是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才不得不出現幼年狀態，學習面對世界責任。而更具諷刺性的是，二戰之後，美國人在現實當中常以世界責任的承擔者自居，可讓美國人感到困惑、甚至泄氣的是，很多國家似乎對此並不領情，包括它的盟友。美國人卻經常不明白自己的善意為甚麼總是遭到別人的誤解，這實在是很反諷。而在尼布爾看來，造成這樣的現象的原因，不僅源於美國自身的主觀態度，也源於人類歷史自身所具有的困境。³⁸

尼布爾指出，反諷的因素是難以被覺察的，尤其對於自我而言更是如此。人類總是容易驕傲的，對於屹立在世界權力之巔的美國人來說就更易如此了，而站在基督教信仰的高度則更能清楚的看到這一點。所以尼布爾在「美國歷史的反諷」這一主題下想提醒美國人，美國這個國家既不像許多美國人所想的那樣無私，也不像他們所想的那樣強大。正因為美國人常常不能夠注意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現實面前也就會有許多困惑、甚至挫折，比如為甚麼美國幫助了別的國家，可是這些國家不但不感恩反而時常對美國口出怨言？更危險的是，它讓美國不能清醒地注意到自身的有限性，也沒有意識到自己並非真的大公無私。就此而言，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於美國是驕傲的、自私的——因為所有人類社會羣體可以說都是如此，而是它不能夠認識到這一點，特別是不能夠認清自己的歷史。這才是美國歷史的反諷的真正意義所在。讓美國人學會思考自身歷史的反諷，並非是要否定美國的世界地位與世界責任，而是要提醒美國要看到自身的局限性。就此而言，尼布爾的這一態度確有其頭腦清醒之處，就是在今天仍有其不可

38. 萊茵霍爾德·尼布爾著，劉蘭富譯，《世界危機》，頁9。

忽視的現實意義。

美國歷史的反諷問題，這是美國在面對自己的世界責任時所必須注意的一個問題。但是對於尼布爾而言，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美國的世界責任還有一層涵義，那就是美國的帝國責任。尼布爾對美國歷史的反諷認識更多的是從美國自身歷史的角度來理解的，而尼布爾對於後一問題的討論則主要從世界史、全球政治的角度來理解，尤其是試圖通過對歷史上帝國現象的分析，來理解美國人當前所面臨的現實外交問題。特別是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危機與匈牙利事件，是促使尼布爾思考美國的全球帝國責任問題的原動力。³⁹

帝國乃是人類歷史中古老而至今仍然存在的現象。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學者把它視為一種落後的、過時的統治形式，認為民族國家的統治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將會取代它。共產主義同樣批判它，但是卻把它和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聯繫起來，認為它是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工具，社會主義必然要取代它。究竟帝國現象的實質是甚麼，它是否真的已經過時，尼布爾對此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尼布爾對「帝國」這一概念，首先是和民族國家相對的意義上來使用的。他承認民族國家所具有的正當性，但是同時也強調，民族國家的出現只是具體的歷史現象，本身並無好壞可言。尼布爾堅決反對所謂「歷史規律」的看法，認為這是危險的，歷史事實並不必然等於倫理的正當性。就以西方歷史而言，中世紀教權的衰落與民族國家的興起，並不等於說教權就必然是邪惡的，而民族國家就是道德的。現代民族國家在性質上也存在着悖謬的一面。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代人類所面臨的政治困境，也是這種單純效忠於民族國家的狹隘政治理念所導致。⁴⁰

就當代世界政治而言，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兩個帝國國家的

39. Ronald Stone, *Professor Reinhold Niebuhr: A Mentor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2), p. 236.

40. Niebuhr, *The Structure of Nations and Empires*, pp. 133-138.

對峙。之所這樣說，是由於儘管美國和蘇聯都聲稱反對帝國和帝國主義，可是另一方面它們又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帝國的特徵來。對於蘇聯，尼布爾在關於世界危機問題的討論上已一再指出，鑑於俄國意識形態所具有的巨大破壞力，他對自由世界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或許美國並不願意承擔帝國這一角色，但是歷史現實讓它成為了世界超強和民主陣營無可質疑的領導人。因此尼布爾主張美國人應當認清這一變化，承認現實，拋棄不切實際的自由主義觀念，並自覺地承擔起某種程度上的帝國角色。當然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尼布爾要拋棄的指自由主義式的外交思想，而不是自由民主本身——相反，尼布爾從來就是它的堅定支持者。現代的自由民主乃是從現代民族國家反對帝國的框架中發展起來的，因此一般來說，越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就越反對帝國這一舊的共同體形式和帝國式的外交政策。自由民主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成長的，對於它的支持是明確的。但是對於人類共同體這一普遍主義的形態則不同。因為在現實當中並沒有這樣的具體形態，包括像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這樣並不充分的形態都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後才出現。因此可以說，自由民主主義所表現出的是一種模糊的普遍主義，這一理念源於法國啟蒙思想，但在美國人的外交政策思想那裏卻表現得最為充分。⁴¹不過問題在於，這種模糊的普遍主義對於當代世界危機的克服並無助力，相反經常由其理想主義而生發出不切實際的外交政策來，實際上反而損害了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利益。美國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所犯的外交錯誤正是這一表現。

因此可以這樣說，尼布爾所反對是那種自由主義所堅持的「模糊的普遍主義」，而非普遍主義本身。出於強烈的反共立場和支持所謂正常國際秩序的實現，尼布爾認為美國人應該堅持一種更為明確的普遍主義態度。在他看來，傳統的自由民主主義一

41. 同上，頁 190-191。

再強調聯合國說明他們不能認清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尼布爾儘管也肯定聯合國的一定作用，但聯合國並非一個世界政府，這是由國際間權力鬥爭的基本格局所決定的，在這個問題上過於一廂情願無疑是幼稚的。由於反殖民主義的後果（尼布爾對此並不太歡迎），以及俄國人在這些新興國家中的意識形態煽動，世界秩序正處於混亂之中。面對這樣一種失序的情勢，美國有必要在世界上一個更為積極的角色，而不是拘泥於過去的傳統看法。尼布爾旗幟鮮明地呼籲：

我們在政策上竭力避免被別人認為是帝國主義，這和是以反帝國主義的名義卻代表一整體的帝國說話的霸權國家的事實形成了強烈對比。但如果帝國主義意味着對權力的責任的練習的話，我們事實上在練習、或應該去練習怎樣得到帝國主義的榮譽。⁴²

在對歷史經驗進行了考察之後，尼布爾得出他的看法：我們必須承接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民族帝國主義的後續角色，而這些民族帝國主義國家也是在舊的普遍共同體衰落之後發展起來的。更重要的是，應該認識到，美國的這種新的帝國角色享有道德上的優越性。⁴³唯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對抗新興的蘇維埃帝國主義。如果要說美國在對帝國問題的認識還有甚麼不足的話，那就是它沒有意識到自己應該扮演更積極的帝國角色。相反，美國應該更主動、更大膽些。在這方面不應當懼怕美國的權力，因為美國的權力仍然受到自由民主準則的約束，是有度的。⁴⁴當然，在美國有效扮演新帝國角色，對抗蘇聯的過程中，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就是應該如何與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打交道。在這方面，尼

42. 同上，頁 15。

43. 同上，頁 25-26。

44. 同上，頁 28-29。

布爾表現出了難得的冷靜，他指出西方人要把自己的想法加之於東方人頭上並非易事，美國人尤其要避免再陷入好心辦壞事的反諷困境之中。

民主制度與其精神是從近代西方發展起來的。但是在現代社會，特別是在西方國家眼中，它越來越被當作一種絕對的價值觀。尼布爾指出，對民主的這種盲目推崇，其實是製造出了一個新的烏托邦式意識形態，而這種新烏托邦在當代很大程度上是在與共產主義的對抗中生發出來的。結果是「自由主義的強烈衝動導致了持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政治家們……都異口同聲的讚美自由，並把它當作一種解決所有社會疾病的萬靈藥」。⁴⁵尼布爾則以為，對民主的這種自由主義式的理解是很成問題的。更糟糕的是，它在現實政治中會帶來嚴重的後果，許多獨立後的殖民地國家的政治困境正說明了這一點。

尼布爾坦率指出，民主制度與文化的建立，首先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共同體意識，它們在西方的實現也是由於長期的歷史偶然因素所致。但在戰後出現的許多新興國家（如果可以稱為國家的話）根本不具備這一條件，不幸的是，西方國家最初卻普遍未能意識到這一點。如印度和尼日利亞，儘管原來的殖民宗主國英國留下了一套看似完備的政府與法治體系，但當英國人離開後，立即陷入了宗教與種族的分裂之中。尼布爾斷言，在像尼日利亞及剛果那樣的非洲國家中，「國家性（nationhood）與民主要戰勝種種語言、部族忠誠以及宗教的多元性可能還需要經歷一個世紀的發展」。⁴⁶因此尼布爾以為，儘管民主的自治政府是一種好的政體形式，但它的適用性卻是有限度的。在那些連共同體的統一性這一基本條件都未達成的地方，它不可能實施。

民主的另一個要素是對個體自由價值的尊重。而相比之下，

45. Reinhold Niebuhr & Paul Sigmund,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 Past and Prospect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pp. 73.

46. 同上，頁 24-25。

東方社會的文化中則明顯缺少對個體權利的尊重這一維度。尼布爾對東方的印度、中國等諸文化做了相應的比較，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見。我們不妨參照一下他對中國文化在這一問題上的評論：「中國的人文主義沒有……給個人在對事物的看法中提供一個更為重要的位置，它的生命維度是指向家庭的。」「在東方，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個體尊嚴』是沒有其精神根基的。這也是為甚麼在中國幾乎沒有對暴政的英雄式的反抗。」這一文化的差異性究竟有多大？尼布爾對此的看法是：

在西方以外的世界，在西方被高度珍視的民主社會的許多價值既不被理解也不渴望得到。……他們不理解極權主義這一新形式的暴政的後果。但即使他們理解了，他們也不可能感受到西方人被剝奪自由的那種痛苦。⁴⁷

尼布爾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的評論是否準確是一回事，不過他至少承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並不是可以簡單移植到其他國度，尤其是異文化。在這一點上，尼布爾的認識無疑是清醒的。當然，尼布爾的上述看法絕不是要否定美國所應承擔的帝國責任，而是要提醒美國人應將理想的目標和有效的現實手段結合起來。對此，我們也不應誤解。

四、結語

尼布爾在冷戰時代的種種政治活動，包括對世界危機和美國歷史責任的神學理解是卓有影響力的。毫無疑問，他的立場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因此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觀的；但儘管如此，他對於某些問題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見，即便在今天看來，仍不失其現實意義。無論是他對美國帝國責任的呼喚，還是對美

47. 同上，頁 124-126。

國歷史的反諷的自我認知，還是對發展中國家民族獨立及民主進程的反思，這些對於當前美國對外政策來說，仍然是必須要面對的重要主題。也正因此，他的相關思想才能在當代美國思想界、政界一再得到回應，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尼布爾的基本結論是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的，我們也許不盡同意其看法，但認真研究其在冷戰時代的所言所行所思，對我們加強認識美國宗教與外交傳統，理解美國政治思想的某一側面，仍不無裨益，也是具有深刻現實意義的。

關鍵詞：萊茵霍爾德·尼布爾 冷戰 世界危機 美國責任

作者電郵地址：oyst@hust.edu.cn

中文書目

- 尼布爾。〈神意與當代文明的混亂〉。蔣慶譯。載劉小楓編，《當代政治神學文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頁3-20。[Niebuhr, Reinhold. "Providenza and the Choas of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JIANG Qing. In Dangdai Zhengzhi Shenxue Wenxuan. Edited by LIU Xiaofeng.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Renmin Press, 2002. pp. 3-20]
- 西摩·馬丁·李普塞。《第一個新興國家》。范建年、張虎、陳少英譯。台北：桂冠圖書，1994。[Lipset, Seymour Martin.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FAN Jiannian, ZHANG Hu & CHEN Shaoying. Taipei: Lauréat Publications, 1994.]
- 桑德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曹大鵬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Saunders, Frances Stonor.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Translated by CAO Dapeng. Beijing: Guoji Wenhua Press, 2002]
- 歐陽肅通。〈美國基督教界的「新保守派之父」尼布爾的復活〉。《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4期。頁171-176。[OUYANG Sutong. "Revival of Reinhold Niebuhr as 'the Father of Neo- Conservative' in American Christianity". *Religious Studies* 4 (2009). pp.171-176.]
- 黎菲渥。〈尼布爾論世界危機〉。載萊因霍爾德·尼布爾。《世界危機》。劉蘭富譯。香港：今日世界社，1963。[Lefever, W. E. "Reinhold Niebuhr on World Crisis". In Reinhold Niebuhr. *World Crisis*. Translated by LIU Lanfu. Hong Kong: Today's World Press, 1963.]

外文書目

- Coffey, John. *Political Realism in American Thought*. Lewisburg, PA: Burkneil University Press, 1977.
- Fox, Richard Wightman. *Reinhold Niebuhr: A Biograph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7;
- Kleinman, Mark L. *A World of Hope, A World of Fear: Henry A. Wallace, Reinhold Niebuhr,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Columbus: Ohio State

- University Press, 2000.
- Niebuhr, Reinhold. "The Religious Level of the World Crisis".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5 (Jan 21, 1946). p. 4.
- _____. "The Fight for Germany". *Life* (October 21, 1946). pp. 65-66.
- _____. "Editorial Notes".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August 4, 1947). p. 2.
- _____. "The Marshall Plan".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Oct 13, 1947). p. 2.
- _____. "God's Design and the Present Disorder of Civilization". in *The Church and the Disorder of Society*. Vol. III. Amsterdam Assembly Serie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9. pp. 13-28.
- _____.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London: Nisbet & Co., Ltd, 1952.
- _____. *Pious and Secular America*. New York: Scribner, 1958.
- _____. *The Structure of Nations and Empir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9.
- _____, & Paul Sigmund.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 Past and Prospect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 Stone, Ronald H. *Reinhold Niebuhr: Prophet to Politician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1.
- _____. *Professor Reinhold Niebuhr: A Mentor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2.
- Stone, Ronald H. *Professor Reinhold Niebuhr: A Mentor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2

Reinhold Niebuhr and the Cold War

OUYANG Sutong

Associate Professor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in American Christianity, Reinhold Niebuhr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cold war and reflected on the related problems from his theology. He seriously considere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risis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ibility for history. He held that Americans should play their role on a global empire and at the same time realized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responsibility. His actions and thoughts on these issues linked with real politics tightly and keep influencing on American political and public areas today.

Keywords: Reinhold Niebuhr; Cold War; World Crisis;
American Responsibility